

论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理论基础

程新平 刘富胜

(1.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331; 2.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让人们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创造高品质生活是习近平对我国新发展阶段发展目的的要求, 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为人民创造高品质生活观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活原理为基础渊源, 吸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活思想, 继承和创新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人民生活理论。

关键词: 高品质生活; 理论; 渊源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21)02-0015-09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10202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重庆要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进一步把“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 并专门论述“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创造高品质生活不仅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 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论述,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活思想的吸取, 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人民生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高品质生活的基本内涵和追求历程

(一) 高品质生活的涵义与内容

《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活”一词的释义为:“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生活最原始的意义在于生存, 满足了生存的需要才能够提供更进一步的品质生活。品质生活是指人们日常生

收稿日期: 2021-01-22

作者简介: 程新平(1971—), 男, 四川巴中人, 博士,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刘富胜(1978—), 男, 重庆南川人, 博士,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 2019年度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阐释专项“重庆创造高品质生活研究”(19SKZDZX12)。

活的品位和质量,是人们经济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和环境生活品质综合发展的重要体现^[1]。生活品质的高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高品质生活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充分发展下,人们所呈现出的具有一定品位和质量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等高度认可和满意的一种生活状态。

高品质生活与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美好生活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前提,高品质生活是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体现。两者都是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呈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美好生活是人民对于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基础上更程度的享受需要,高品质生活是人的美好生活基础上高层次的需要,是满足享受需要基础上的发展需要。美好生活是从“单一性”到“整体性”的满足,体现在由少数的满足转变为多数甚至全体的满足的过程。高品质生活是从“整体性”到“多样性”的满足,不仅仅在于对美好生活的整体满足,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满足不同个体对品质生活的要求,实现整体性向多样性转变。

高品质生活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高度和品质的有机整体的生活状态。从宏观上说,其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部分的相互依赖和联系;从微观上说,包含了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体现人民生活状态的方方面面。高品质生活的主要内容具体呈现为物质、精神、制度、家庭以及个人五个层面。物质富足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高质量的文化生活、高要求的道德修养、高层次的理想信仰是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要;维护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生态美好的制度是实现高品质生活的保障;和睦的家庭氛围、开明的家庭理念、良好的家庭美德是高品质生活在家庭层面的体现;优秀品质、艰苦精神、融入参与是实现高品质生活的个人要求。

(二)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创造高品质生活的不懈追求

高品质生活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轻易即可达到的,而是在一定条件发展成熟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的生活追求是不同的,其大致经历了从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温饱问题的解决、达到基本小康、全面建成小康、呈现美好生活到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发展过程和阶段。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32}新中国建立初期,生活要素主要是满足对基本生存的需要。这一阶段主要是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致力于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温饱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32}这是满足生存需要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深刻总结以往经验,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提出“小康”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小康生活的阶段。20世纪末我国进入了建设总体小康时代,还处于偏重物质消费的生活状态。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目标任务的表述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3]。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建成和建设仅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水平更高层次的体现,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发展目标。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面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4]要“紧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4],不断满足我国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高品质生活,是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期待和满足,更注重精神文化的满足,是对社会发展程度、社会生活品质有更高要求的生活状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追求的重要保障。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活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专门探讨生活原理的论著,但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是贯穿其著作的一条主线。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揭示了世俗生活的必然性、经济生活的基础性、劳动生活的超越性、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和科技生活的双面性。

(一) 世俗生活与精神向往

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自古以来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的问题。传统哲学家总是在神圣与世俗、理性与感性之间划定鸿沟,强调神圣生活和理性生活的优越性,贬低世俗生活和感性生活的必要性。马克思强调现实生活的物质本性。“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5]3}。马克思并不绝对否定宗教生活的重要意义,认为宗教能够给人们带来慰藉;同时指出宗教对本应被改变的现实采取了容忍和漠视的态度,宗教能够影响到人们意识,但影响意识根本没有触及现实。“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6]4}。马克思并不赞同用理性或者爱去取代宗教,无论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性,还是旧唯物主义者的“爱”都是着眼意识来看问题,但问题的根本不在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525},现实生活的问题只能在现实中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强调现实生活的物质性,并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在培根那里还“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但是在霍布斯那里就失去了“诗情画意”,变得“漠视人”和“毫无血肉”^[6]。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动物遵循着种的尺度,而人能够按照任何种的尺度,并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自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是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6]499}。感性的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对象是直观的对象,而不是被感性的人实践改造的对象。人既通过改造对象来满足需求,同时也在改造对象中产生了新的需求;人有生存和享受的物质需求,同时也有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追求。

(二) 经济生活与超越资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具有社会继承性,每一代人都立足前代人的基础,继续发展前代人的“工业和交往”^{[6]528};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直接继承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470}。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生产力具有了世界历史属性,“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8]35}。先进与落后,不能仅仅从民族自身的历史进行比较,而是要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是无法克服的: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私有制的延续,不能消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成果被少部分人所独占,同时造就了大量赤贫人口,是“现代奴隶制”;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持续,在带来先进生产力的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与

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无法克服,将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道义出发认为,作为生产力的实际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理应成为社会成果的共享者;而且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必然要承担起解放人类社会的重任,即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解放全人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生产力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须的前提”,因为长期生产力落后,“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470}。

(三) 劳动生活与全面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劳动既是人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方式。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当黑格尔把人的成长理解为一种经历和过程的时候,无疑具有合理性,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真正的人视为自己劳动的结果;但当黑格尔把这种经历和过程仅仅理解为精神活动的时候,无疑又陷入了“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6]204}。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需要通过改造对象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也需要在改造对象中证明自我。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直接提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8]550}。劳动不仅造就了人的身体、人的语言和人的思维,而且构建了人的交往,成为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

劳动是人类改造对象满足需求的活动。人与对象的关系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个体总是从社会中习得改造自然的本领,同时也要遵从社会特有的规范。劳动总是社会关系中的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中,总是存在着部分人凭借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劳动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种异化达到了顶峰。由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劳动者不能从劳动中感受到成就,而是感受到压抑;劳动者不是热爱劳动,而是拼命想脱离劳动;劳动创造得越多,劳动者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156}。

劳动异化既意味着劳动是多数人谋生的手段,也意味着劳动制约着人们的全面发展。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在劳动中被迫服从某种安排,不能做到“自由自觉”,成为马尔库塞所讲的“单向度的人”;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之间因为生存压力而相互竞争,缺乏全面发展的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是个体发展的需要,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从“必然王国”迈向了“自由王国”。

(四) 社会生活与自由个性

个体的生存总是要面对两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6]532}社会关系的核心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核心是所有制关系。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所有制关系中进行社会交往,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共同体。马克思把私有制社会中的共同体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即表面上存在着普遍一致的利益,本质上体现了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

生产关系由生产力所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的产物。我们既不能相信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描述的共同体,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曾经一度是社会理性代表,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剥削,就要追求绝对公平、绝对一致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在《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之为“粗陋的共产主义”,认为“粗陋的共产主义”不仅没有超越资本主义,而且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

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阶段,实现了“人的依赖性”向“物的依赖性”的转变,实现了人身依附向形式自由的转变。共产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就能实现由“物的依赖性”向“自由全面发展”转变,实

现“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转变,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实现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的存在,而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平台和空间。

(五)科技生活与保护自然

科学是对规律的探索 and 发现,技术是方法的创造和发明。近代以来,科学从经验观察发展到了抽象分析,从个人兴趣发展到了社会建制。科学与技术之间逐渐走向了融合,科学发现推动着技术创新,技术手段促进着科学发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随着专利制度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技术发明中来,先后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马克思一方面看到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另一方面也认为科学技术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因素。由于工人并不占有生产资料,“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的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6]109}。科学技术没有成为工人的力量,而是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

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二是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自然适应人的改造,而是人要适应科学技术的要求,科学技术要求人成为生产工艺的组成部分;三是科学技术实现了培根所讲的“知识就是力量”。人对自然的改造强度越来越大,当人类行为的影响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值,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恩格斯警示人类要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9]560}。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活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高品质生活思想,对物质基础与精神境界、身体健康与心情愉悦、个体舒适与社会和谐等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成为我们如何在新时代追求和构建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资源。

(一)德性修养与责任担当的精神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德性修养和责任担当。

德性修养就是要通过内省、涵养和践行等功夫,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内省就是要牢固树立这样的道德法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内省就是要将个体放到群体之中,从德性的角度对个体行为提出要求。涵养则是要从人与自然的区别出发,看到人不仅具有外在的自然需求,而且还具有内在的德性根源,这种内在的德性根源在孟子那里就是“良知”。孟子认为人们看到“孺子入井”所具有的恻隐之心,就充分说明人先天具有这种良知。这种良知往往在各种利益计较中被遮蔽,去除这些遮蔽,就能够回归良知,这就是涵养浩然正气的过程。践行就是把内在的道德法则落到实践之中,经受实践的反复考验,这个过程在王阳明看来就是“致良知”。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就是认为仅有理论上的知并非真知,真知一定体现在实践中。

责任担当就是每个人都是有使命的存在,这种使命不仅是对个体和家人的责任,也是对社会、国家和人类的责任。儒家强调君子之道,认为君子不仅有社会地位和德行操守,而且更应该有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在遭遇困扰的时候,也认为自己担负着传播道义的责任,是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前行的。《大学》中对读书人的要求,不仅要修身齐家,而且要治国平天下。这种责任担当与德行修养一样,都是从内在出发,而不是从制度出发,因此对个体的要求更高。

(二) 道法自然与抱朴守一的养生之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生活的理解,不仅是精神,而且也是有身体根基的,这种身体根基就是道法自然和抱朴守一。

道法自然就是人类要遵循自然界的法则,要参照自然界的法则,人不能离开自然界,也不能离开自然界的维度进行思考和行为。就人是自然物而言,人的生命与自然界中其他物体的生命一样,都有其内在的制约因素,欲望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有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追求,甚至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这就是违背了自然。人生活在自然界中,人的行为会对自然造成影响,当这种影响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阈值,自然界就要报复人类,因此人不能涸泽而渔,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抱朴守一就是将道法自然的理念运用到生命健康上,身体是人的根本,人的任何行为和成就都是建立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人们忙于追求外在事物,忘记了对这个根本的呵护,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根基。要呵护身体,就要注重养身之道,就要抱朴守一。对身体而言,要尽量减少人的欲望,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加强身体机能锻炼,既不能让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也不能只关注某方面的机能,要重视身体的整体运动和全面健康,这样才能有高质量生活。

(三) 平等关照与随缘自适的心理调剂

人是自然存在,也是社会存在。人只要存在,就必须与自然和社会打交道,就会产生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问题。理想是主观的,现实是客观的,理想要在现实中实现,需要主观的努力,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机会或机缘。

平等关照就是要看到各种生命都是有限的存在,都因为具备条件而生,也因为条件消逝而灭。从这个角度而言,各种生命之间有生存的竞争,但谈不上生命本身的高低贵贱。任何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人不仅应该重视自己的存在,也应该看到他者的存在。我在与他在构成了生命的共在。这种共在被称为“缘分”,人应该珍视这样一种缘分,不能把生命中的他者看作是敌对的力量,而应该看做是自我成就的力量。

随缘自适就是,既然我们与其他生命共在,我们就不能完全主宰个体的命运。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但现实的生活并不是按照任何个体的意愿而行。每个人的努力、自然界的环境以及无法预测的因素,都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与我们生命照面的一切,都要坦然面对。这并非意味着不作为,而是意味着我们在完成了努力之后,不能强求最后的效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生活思想,总体上讲反映了农耕时代人民对生活的态度,但其中也有部分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具有启迪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索高品质生活的过程中,要对这些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生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生活观进行批判,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活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生活原理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反映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性诉求。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存在着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原理就具有诊断和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符合我国历史和国情的生活理论。

(一) 强调个体生活与民族命运的紧密相连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对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都

在追寻中华民族复兴道路。在各种对比尝试的探索中,认识到中外的差距是传统与现代的差距。然而对现代的认识并不一致,先是把现代定义为技术,开启了洋务运动;进而把现代定义为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也产生了“老师总是欺负学生”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让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从此之后,中国改换了方向”^[9]。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路径都是相同的,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个体生活。毛泽东认为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要尊重群众对生活的选择和要求,要从人民群众“需要”和“自愿”出发,不能从我们脑子的“幻想”和我们替人民群众“下决心”出发^[10]。邓小平认为符合群众利益的事情,就要想一切办法去做;对于有损群众利益的事情就要坚决反对;对群众困难要“毫不犹豫地采取办法”^[11]。江泽民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群众之所需”^[12]。胡锦涛指出,要把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从而使党的决策体现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反映多数的群众的普遍愿望又照顾部分群众的特殊要求^[1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4]。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把关心群众和组织领导群众结合起来,把群众生活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毛泽东认为个人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因此“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15]²⁰⁸。江泽民指出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胡锦涛指出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梦想,中国梦既是国家和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人的梦,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二) 坚持幸福生活与艰苦奋斗的辩证统一

幸福既有客观基础,也是主观感受;既是社会范畴,也是历史概念。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所要追求的幸福是人民群众的幸福,而非个人的幸福;所要追求的持续的幸福,而非暂时的幸福;是有制度保障的幸福,而非偶然机遇的幸福。

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目标。毛泽东认为各个阶级对生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农民占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因此要使农民得到解放,就要“废除封建制”,要让中国强起来,就要“发展工业化”,在此基础上“提高文化”^[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要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论十大关系》中,认为要协调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因为工业和轻工业直接关系人民生活;要协调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要解决人民群众“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17]。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出了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增加了国防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小康生活,即在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指出在基本小康实现后,还需要解决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还需要通过二十年左右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锦涛指出要坚持科学发展,使人民更加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同时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同时认为只有通过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幸福生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就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艰苦奋斗是共产党的“特色”,是区别其他政党的所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艰苦奋斗作为“两个务必”之一,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邓小平在《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中指出:“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没有艰辛就不算奋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习近平总书记讲“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一种大无畏牺牲精神和奋斗精神,不计个人得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解决人民群众的需求问题,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 倡导精神生活与指导思想的有机结合

现实生活包含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是基础,精神生活则是提升;没有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是空的;没有精神追求的物质生活则是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得益彰,才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也就是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的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这种精神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就是毛泽东在《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中指出的物质生活简朴些、精神生活丰富些。这种精神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培养的。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而且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守纪律的人,要培养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江泽民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只有阶级的人性。文艺工作必须要解决立场问题,即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如果从本本出发,我们就可能陷入抽象的教条主义,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干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16]110}。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立党立国的基础,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根基。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新时代追求和创造高品质生活,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王国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和谐创业提高生活品质[J].杭州通讯,2006(10).
- [2]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唐洲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N].人民日报,2015-12-31.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邓小平.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 [12] 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1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4]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2019.
-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reating High-Quality Life

Cheng Jinping Liu Fusheng

(1.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2.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Letting Chinese people have a blissful life is the constant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Creating high-quality life is Xi Jinping's requir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manifests th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of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creating high-quality life for people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has its profound theory, which springs from the origin of life-principle theory of classic Marxism authors, absorbs the thoughts on life from the meri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s and innovates the people's life theory of the leading collective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he party.

Keywords: high-quality life; theory; origin

[责任编辑:左福生]